



百家出版社

彭小莲 → 著

在路上





回家路上



彭小莲 → 著
百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家路上:彭小莲文集 / 彭小莲著. — 上海: 百家出版社, 2004.4

ISBN 7-80703-016-X

I. 回... II. 彭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9885 号

书 名 回家路上——彭小莲文集

编 著 者 彭小莲

责任编辑 丁翔华 王 刚

封面设计 王 俭

装帧设计 唐云辉

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28000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703-016-X / I·5

定 价 16.00 元

肖关鸿

序

大凡彭小莲在场，一定是她的声音盖过所有的人。她说话生动形象，喜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，让人忍不住想笑，她自己却不笑。她说话有点张狂，甚至有点刻薄。任何一位天仙美女到她嘴里一定挑出点疵来，而这疵点又一定夸张成丑八怪。但你也不能不佩服她眼光的狠毒，一针见血地抓住了对方的特征，让你再也忘不了这张漫画。

她语言的魅力几乎征服所有听她说话的人，包括我女儿。我女儿对人也很挑剔，再大的名人她见过一次就无甚兴趣，惟有小莲来家里，她宁可不睡觉也要挤在旁边听她神聊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说话的风格一点没有变。她好像长不大。

我第一次看见她时，她还在农村插队。差一点被选去拍文革中的一部样板戏，最后因为她的“出身不好”而被淘汰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父亲彭柏山已经含冤去世，她母亲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一位坚强的乐观的漂亮的不折不挠的老太太。父母一生献给了革命，而他们的子女却受到“革命”的歧视。可能是这次打击，促使她在文革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我没问过她，但依她的性格会这样做。

幸亏她没有去演电影，而与张艺谋、陈凯歌做了同学（我知道，她看见我这样写，一定又会说，辛酸辛酸，活在别人身上了。做了近二十年的导演，还要去巴结别人的光彩）。但是，导演还是让她的才

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她的电影在国外得过许多大奖。但是,在我看来,她至今还没有拍出一部能让她自己满意、让世人震惊的片子,好像她运气不佳。她想拍的片子总是阴差阳错没能如愿。她有大导演的素质!尤其是她的文化素养在中国导演中没有几个人可以与她相提并论。而我相信,文化素养在导演以后的比拼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。

电影对于艺术家是有极大的诱惑力,但是又是艺术家个人无法完全驾驭,掣肘它的非艺术因素太多。而文字写作则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完成的。小说即使锁在抽屉里,也还是小说,对作家来说已经完成了。小莲在银幕上没有能表达和无法表达的东西都流泻到她的笔底。电影上的不满足成就了她的文学梦。在电影导演中像小莲这样有着强烈写作欲望的,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。

这可能与她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。她父亲彭柏山是军人也是作家,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,参加了“左联”,成了鲁迅先生的学生;她的母亲朱微明当过记者也是翻译家。她看书之多之快是早年养成的习惯。二十多年前,她与我大谈卡夫卡的时候,文学界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懂卡夫卡,而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早就溶化在她的血脉里。我常常从她自我调侃的无奈中感受到她灵魂深处无法排解的孤独感。

她表面上的大大咧咧、豁达和随意给人很多错觉,从她的作品里看见的她,内心非常细腻,她对人物描述,对细节的捕捉,对环境的观察,细腻到都有点神经质的地步。但是走进拍摄现场的时候,大家说她几乎不像一个女人,骂起人来,不仅比男人还凶,还满嘴脏话。她对我说,导演不是人干的活,你不强大起来,现场就控制不住。

这也是后来我才明白,她说话为什么嗓门老是这么高。

她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写她父母那代人生活的《他们的岁月》。我一口气读完她的文稿,那份震撼心灵的力量使我欲哭无泪,久久

不能入睡。这是中国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纪实作品。

但是,纪实色彩同样体现在她的小说里。她并不侧重叙述故事描写情节,而是描述情绪和意识的流动。我读这本小说集的时候,始终看见的是她自己的影子。她从上海到美国,又从美国回到上海,不管在哪里,她的文字和情绪里,都渗透出现代人的一份焦灼、紧张、没有安全感的一份孤独。用她小说里的人物说话:

“实际上,说到政治,我比她(母亲)感受到更深的一种担惊受怕,因为我还没有被卷进去。似乎我正站在悬崖的边上,只要往那里瞟一眼,这种恐怖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我的血液,渐渐地在身体四周蔓延,人像漂浮起来一样,没有根,没有依靠,身体开始发软。最后是被一份惧怕把心包裹起来了。一种无法表达的感觉,慌慌张张。至今,我还不知道那谜底在哪里……”

至今,她仍在上海与美国之间飞来飞去。她不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逸的生活空间,甚至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所谓。物质对她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她的生活状态极其简单。她说可以做到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牵挂。这样的女人是很少见的。她大概是在随意的生活里,为自己寻找一个躲避现实的借口。

她惟一的追求是创作,只有在创作的时候,才能够使她兴奋。大概是她太独立了,她总是我行我素。人们说她跟不上潮流,她不屑地跟我说:“我怎么还要去跟什么潮流啊,我都在潮流前面了。”这又是她,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又变得不着边际的骄傲。

2003年8月5日

作者简介

彭小莲,1953年6月生于上海。1969年4月前往江西农村插队九年。1978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1982年毕业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场记工作。1986年1月独立执导影片。1989年获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留学。完成学业后,1996年回国,成为自由职业签约导演。

拍片之余,进行文学创作,剧本《艰难的真话》1991年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剧本奖。代表作:《他们的岁月》在上海和香港发表出版。中篇《被磨蚀的渴望》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,在国外发表。

主要拍摄影片:

2002-2003 《美丽上海》——导演/编剧

2001-2002 《假装没感觉》——导演/编剧

2003 意大利都灵妇女电影节最佳导演

意大利都灵妇女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

意大利都灵妇女电影节最佳女配角

2002 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女主角

2001 《满山红柿》——联合导演/构成/剪接

(帮助完成了世界已故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留下的影片。)

2002 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

2001 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影片

2000 《可了的魔伞》——导演/编剧

(中国第一部三维计算机动画和真人合成的影片)

- 1999 《上海纪事》——导演/联合编剧
1999 中国政府华表奖优秀影片奖
- 1997 《犬杀》——导演
(侦探片)
- 1992— 《比里·哈莱姆》——导演/制片
(关于一个中国现代派画家被杀死在纽约的纪录片)
1995 初剪获洛克菲勒个人奖(Scholar Fellowship)
- 1989 《艰难的真话》——导演/编剧
(关于巴金在文革中的故事。后因故停拍)
1991 获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奖
- 1988 《女人的故事》——导演
1990 第12届巴黎妇女电影节评审团奖
1988 夏威夷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
- 1986 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——导演
1988 中国政府奖优秀影片奖
1987 金鸡奖最佳儿童片
1987 中国儿童电影节童牛奖最佳影片
1987 中国儿童电影节童牛奖最佳导演

CONTENTS

目录

1 / A 阿冰顿广场

三十六岁的人跑到纽约,这意味着什么?我根本没来得及想。而我却一点都不了解纽约。飞机从纽约夜晚上空往下降时,引擎震得我耳朵发胀,像所有的碎木片塞在里面……

44 / B 被磨蚀的渴望

当妹妹的声音消失时,我发现,“爱情”这个词组虽然简单,可是谁都逃脱不了。当一个人的生命,真正的生命在燃烧起来的时候,都在寻找它,为它付出……可是,我再想起这些事时,总觉得那是个很厚的疤,一个皱皱巴巴的硬疙瘩。我从来不去碰它……

66 / C 在我的背上……

父亲像个符号,像个梦游中的幻影,更像在黑暗中,我时刻在和他对话,可是我听不见回答。我朝前走,他站着不动。我竟然穿越过他,我却依然没有任何感觉和反应……

93 / D 燃烧的联系

我多想大哭一场,我怎么会是一个女人,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人。没有事业,也没有婚姻。但我还是顽强地在寻找那个男人。当我做着我的白日梦的时候,我看见的却依然是女人……

130 / E 一滴羊屎

突然,壁橱间的门开了,女朋友的声音像走向高潮的

小号,在最紧张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房间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那“羊屎”慢慢地走了出来,依然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。他挪动了一下屁股,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,摸出一把肮脏的钞票,票面的图像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,钞票软塌塌的,像一团乱棉花捏在他手里……

158 / F 黑夜·白昼

车简站着没有动弹,女列车员用力推了一下她的脊背,她如梦初醒,深深地低下头,像犯人一样走在前面。她又一次、又一次走过那些车厢。这简直像是拖人出去斩首示众,她实在受不了了。老天爷,她又想到了爸爸和妈妈。她都想去死!

189 / G 流放者的归来

注视着博物馆,这都是我当年在中国时,一个久远的梦想——看看巴黎的卢浮宫,看看美国的博物馆。现在我站在这里,站立在我自己的梦幻中,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感动。直到很久很久以后,我才终于明白:纽约是一个到来时让人感到兴奋,离去时也永远永远不会后悔的城市!

235 / H 回家路上……

一个低沉却又严厉的声音在我身后问道:“你在那里看什么?”

我猛地站立起来,回过头去,没有想到身后站着一个人,那人紧紧地挨着我,身上的纽扣在我脸上狠狠地刮了一下。好像是一个便衣,就是那些在街上来回走动的人,所有的人面目都是一样的,我什么都看不清楚,只记得他穿着中山装,那纽扣在我脸上刮出了疤痕……



三十六岁的人跑到纽约,这意味着什么?我根本没来得及想。而我却一点都不了解纽约。飞机从纽约夜晚上空往下降时,引擎震得我耳朵发胀,像所有的碎木片都塞在里面……

A 初到纽约

阿冰顿广场

走到广场才下午四点多钟,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,它竟然离我们大学这么近。来得太早了,我和艾米约了六点钟去她家看房子的,然后再决定是否出租。只能在广场等待。我想看完布置下来的回家作业。可是挨着冰凉的铁椅子坐下时,瞌睡一个接着一个,眼泪淌得满脸满书都是,我努力地支撑着朝书上看,英文字连成了一片,像电子游戏中的数字,上上下下在自由地游动。

对我来说,三十六岁的人跑到纽约,这意味着什么?我根本没来得及想。而我却一点都不了解纽约。飞机从纽约夜晚的上空往下降时,引擎震得我耳朵发胀,像所有的碎木片都塞在里面。飞机颠簸时,只觉得耳朵隐隐作痛。我探头往窗外看,我大张着嘴,拼命地呼吸,心慌得厉害,像掉进了河里,慢慢地,慢慢地往下沉,窗下的纽约城灯火辉煌,像是快被火烧透的炭,燃得那么灿烂、炽热。大概是害

怕,害怕得那么彻底,像要被它烧化一样,却又燃起那种向往,一种混乱的向往,我一点都不清楚。那究竟是什么事,我从来不敢去想。生和死都是我自己不能把握的。尤其是生,我毫无选择,谁也没有来征求我的意见,我就给扔到世界上来了。

我已经看见艾米家的房子了,就在广场的边上。那是一幢老式公寓,门上拱顶处还雕着花,巨大的图案一直延伸到四层楼。

艾米,艾米。我真想大声地叫你。我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,让我找个房子住下来吧。来了两个月,我搬了三次家,四处看房子,打电话联系,讨价还价……天已经转冷了,我希望能够结束了。人们常说,我们这一代在“文革”中长大的人,给锻炼得特别坚强,什么都挺得住,撑得下去。可是,我渐渐地害怕坚强,怕被锻炼得那么能吃苦。我真怕。美国、纽约,街上可以躺着乞丐,他们领着救济金,日子也不好过,但他们在太阳底下躺着看小说。我对朋友说话时,结结巴巴,前言不搭后语,朋友看都不朝我看,鄙视地撇了撇嘴角,不要理你,谁也没有求你上纽约,这片城市就是在坚强中燃烧起来的。

我缩起脑袋,怯怯地看着周围,我有点害怕。美国并不像你理解的那样真实,不敢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。年龄在那里,经历在那里,还有我那些发表过的作品,这些对于我都变成一种尺度,我必须踏进一种规范。那是什么样的规范?谁都说不清,也没有人知道。但我得像所有人一样,老老实实地按规范去做。是谁划定的这种规范,同样没有人知道。世界就这么稀奇古怪地给确定下来了,而后没有人去问为什么,都自觉地去遵守这一规范。而后,大家都在说:必须坚强起来。

都说我是幸运的,我想,这是对的。拿着奖学金,不用打工,读闲书……一点不错,就是交不起纽约的房租。这闲书读得不像你想像中的那么“闲”……这什么都不算,我是幸运的……我死死地盯住广场上的青铜像看着,似乎想把自己的幸运刻在上面,像那雕塑一样永恒。艾米在电话里对我说话时,声音细细的,说得很慢,时而停顿一下,显得那么有条不紊。她说,我只要付她300美金一个月,我就可以有自己的房间,可以自己个人的私生活。



想到她说的这些,我心里甜滋滋的。多好,又便宜离学校又近,把车费也省了,我那点奖学金够我开销了。艾米完全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有钱的老太太,可能她怕孤独,愿意找个人陪住,所以就那么便宜了。听她说话,就能感觉到是个挺有教养的人,说话、用词都很注意,总是选择文章里常常出现的句子。有时候,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心理,很想和有钱人待在一起。多么糟糕和无聊的愿望,可是心理上老战胜不了这一点。几乎是一种贪小便宜的愿望,时时刻刻会爬出来,督促你去做些下流事情。我还在幻想艾米和她的家,至少和她住在一起,我的英文口语能进步很大。她肯定是个有钱人。

到纽约两个月了,艾米家的房子是我惟一能开口告诉别人的。现在住的房子……够穷酸的。上学的时候,只见书包上爬过什么虫子,抓在手上才认出那是臭虫,又大又扁,我用纸把它包好装在瓶子里,晚上找房东去了。房东大叫着说这跟她无关,她也是租了别人的房子。凶得厉害。谁都说纽约脏,可是谁也没有在纽约看见臭虫,坐在教室里,总是觉得浑身发痒,老师说了什么,我已经听不见了,只想用手插进领子里,在背上狠狠地搔痒。也许我真就这样做了,真丑陋。同学在对我说,他看过我写的小说,那是被译成了英文的,他很羡慕我,因为我那么成功。

我不知道成功意味着什么。臭虫依然大大方方地从我身上爬过。是从我的身上,而不是从他的身上爬过。

“我是在纽约长大的,我怎么从来没碰到这些事?”

“太简单了,因为你们家有钱。”

“这跟有钱有什么关系,我也是在找房子住。”

“你会去住这么便宜的房子吗?”

我们俩面面相觑,大家都觉得很不自在。沉默了片刻,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:“我很抱歉。”

当我从骚乱中走出来的时候,恢复了常态,对谁都不用说抱歉。我曾经去看房子,走进屋子才发现,那是一个大大的仓库,没有窗子,大砖块叠着,切分成好几间屋子。我推错了一间房门,两个男人躺在地上,穿得很破也很脏,头发像一堆灰尘一样蒙在头上,有一个

挽起了袖子,另一个在为他注射。门背后躺着一个女人,我没看清楚就被房东拉出来了。两个男人满不在乎地朝我笑笑。他们在注射毒品。我没笑,当时真被吓着了。我没有说“我很抱歉”。

我一个人坐在阿冰顿广场的椅子上消磨时间。这不像纽约人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呢?怎么变得这么悠闲?我躬起身子,双手蒙住脸,什么都不想看见。我觉得自己被扔出了什么地方,这里不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从小的时候起,我就知道有个美国,那是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社会。我读过一个故事,黑人小比尔被白人杀死了。我深深地仇恨这个白人……

双手捂住眼睛也是徒劳无益,穷困依然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。这穷困是无法逃避的,它逼着你直视现实。我说不清楚,我总是感到害怕,不论在中国或者是美国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我一辈子就是害怕,就是为住房问题苦恼。直到我离开中国时,还为了房子和母亲大吵一架。房子,是个沉重的十字架,我从中国驮着它踏上了美国国土,它依然死死地趴在我的背上。我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,谁都不说话。洋铁皮做的灯罩涂着深绿色的油漆,沿着灯罩的边缘,油漆已经剥落了,露出斑斑点点的铁锈。从那里,昏黄的灯光洒在桌上。母亲低着头在纳鞋底,当她用劲把针扎进厚厚的鞋底之后,拔出针,将线缠在手背上死劲地拽着。线勒在她生满冻疮、肿得发紫的手背上。手背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,光亮亮的,鞋线陷在里面像要把皮肤割裂一样。那时候,我才十二岁,我不知道怜惜母亲,我什么都不懂,更不能理解她的痛苦,以及她所面临的一切。那是在“文革”中间,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太多了,家家如此,反倒成为一种安慰和解脱,心里变得很自然,不快乐也不苦恼。父亲被重新关进监狱,我们一家被赶出原来住的房子,搬进大楼底下的汽车间里。那屋子三面是墙,一面是门,没有窗子,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。白天的时候,我常常匆匆忙忙锁上门,提着裤子往公共厕所



跑,这几乎成为我生活中的游戏。非憋到要尿出来时才跑去上厕所。母亲看见我这样,就火冒三丈。她从床底下踢出一个小尿盆,没好气地吼道:“老毛病怎么改不掉的?”我吓得直往外跑,我知道,我一旦尿在这盆里,这一晚上可得给她骂个没完。

她不停地纳鞋底,纳了一双又一双。给爸爸的,给小姐姐的,给大哥大姐的,还有我。等鞋底都纳齐时,我们穿在脚上的又破了,她又重新开始做起。我第一次感到母亲可怜,是从这些鞋底上。它们一摞摞整齐地叠放在床头,千针万线。我看见母亲全变了。自从那张大写字桌被抄家拿走以后,再也看不见她写字、翻译作品了。写字桌几乎是她做人的象征,拿走了就全完了。以往她手上的那点秀气都变成红肿的冻疮。终于有一天,鞋底线把冻疮勒破了,血和白白的脓水从肿起的手背上往下淌,母亲用一块破布把手包扎起来。结果破布粘在伤口上了。当她揭去破布时,刚恢复的伤口又破裂了。她不再用布包扎。这一时期,她也不再纳鞋底,她干些别的活,手依然和冷水接触,伤口烂成一大片,猩红的肉,软软的,烂乎乎地露在皮肤外面。直到春天来时,天暖了,冻疮开始结疤,可是那疤变成青绿色的,像一块发霉的铜锈片长在手上。肿开始消退,手变成一张老太婆的死脸,挤满了皱纹,松松垮垮的皮肤包裹着母亲的手。

我们的汽车间朝北,终日晒不到太阳,屋子正中的地上,是一个大大的阴沟洞,铁盖子上刻着英文字母:1932年制造。天一冷,盖子的窟窿里就会冒出一阵阵白气,从那儿散发出臭味。天热时,外面下着大雨,从窟窿里就泛起一股股黑水和污垢,雨越下越大,污水越泛越盛,有时就把小屋淹没了。天晴时,母亲让我脱掉鞋子,把猪血老粉掺在一起。我赤着脚不停地在上面踩着,脚上沾满了猪血和老粉,我在阳光下又蹦又跳,当哪一块没踩碎时,我像金鸡独立一样站在上面,闭上眼睛,一昂头使劲踩去,当它碎了,我赶紧把猪血掺进去。

“可以了,快洗脚去。”

母亲总是非常烦躁,她变得很少说话,一开口却憋着一肚子的火。她动作利落,迅速地用小刀铲刮上拌好的老粉,三下两下就把阴沟盖子涂满、封掉,然后打开大木门,让太阳晒着。

母亲于什么都很称职,尤其是体力活,像个男人。一种坚强支撑着她。她的坚强几乎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。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个男人,她的母爱也从她的坚强中渗透出来。对我们孩子,孩子的朋友们,都倾注了她的爱。她的一生,几乎在这爱的消耗中寻找安慰,解除孤独。她坚强到从来不要求我们理解她,她也很难理解我们。只是一味地爱,用她全部的心,面对一片苦难的沙漠,倾注,倾注,似乎想用爱灌溉出她的生活。真的,因为有了她,这黑洞洞的小屋,不是特别可怕。

6 可怕的是白天。母亲去劳改队干活,小姐姐也到学校去了,她白天黑夜地读书,毛选四卷都看过两遍了,上面画满了杠杠。哥哥说,小姐姐就是书读得太多变傻了。母亲训斥着哥哥,说这样讲话,要闯祸的。大哥哥大姐姐都住在大学里不回来。母亲要我也认真读毛主席的书。屋里黑乎乎的,我捧起书就想睡觉。母亲不许我出去和任何人玩,其实出去了也找不到小朋友玩。我待着太无聊,心里发慌,莫名其妙地害怕。那时候,全中国大人小孩都在背诵“老三篇”,都说遇到困难一读就灵,我问小姐姐真这么灵吗?小姐姐恐怖地看着我说:“你好反动呵!”我从此不敢再问任何人。除了小姐姐,我相信小姐姐的话,她的四卷书已经看得松松的,像四只大面包,纸页的边缘都被摸黑了,摸破了,书角卷了起来。

这是“文革”的生活,对于我们一点都不新鲜。我在那种害怕的状态下,着实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跨过桌子,踩在椅子上,趴在新开的小窗子往外看。我什么也不想,就这么趴着,两手垫在下巴壳下,一站就是一下午。看着影子越拉越长,一直到路灯亮了。每天都发生同样的事情,红卫兵在墙上刷着标语,大声呼喊革命口号,时而又会走过一个行人,身上挂满了毛主席像章;街上来来往往的人,穿的不是绿军装就是蓝布褂子,什么都是一样的,每天重复着昨天。只有一次,又有红卫兵来抄家了,那都过了风头,所以锣敲得很响,也没什么人去看。

我就这么趴着,不出门不惹事就行,书读不读,母亲也无心过问了。看着窗外,就看见屋子外边那一片蓝天,那似乎是一种无限,不